



当 | 代 | 中 | 国 | 社 | 会 | 变 | 迁 | 研 | 究 | 文 | 库

找回家庭： 农村代际合作与老年精神健康

王 晶〇著

*Bring the Family Back In: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当 | 代 | 中 | 国 | 社 | 会 | 变 | 迁 | 研 | 究 | 文 | 库

找回家庭： 农村代际合作与老年精神健康

王 晶◎著

Bring the Family Back In: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找回家庭：农村代际合作与老年精神健康 / 王晶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9067 - 0

I. ①找… II. ①王… III. ①农村 - 老年人 - 家庭社会学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9722 号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

找回家庭：农村代际合作与老年精神健康

著者 / 王晶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谢蕊芬

责任编辑 / 马云馨 谢蕊芬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学编辑部(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5 字数：243 千字

版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067 - 0

定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任 李培林

副主任 陈光金 张翼

委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婴婴 景天魁 李春玲 李银河

罗红光 王春光 王晓毅 王延中

王颖 杨宜音



总序

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新成长

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大学的社会学人，已经陆续到了花甲之年。中国空前巨大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社会学研究的使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学界新一代学人快速成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拨乱反正。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以紧迫的语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此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社会学在其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学擅长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社会学研究所第三任

所长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形成了 100 多卷本调查著作，已建立了 60 多个县（市）的基础问卷调查资料数据库，现正在组织进行“百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学研究所的主持下，从 1992 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社会蓝皮书”，至今已出版 20 本，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我主持的从 2006 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也已经进行了三次，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变迁数据库。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机遇。2005 年 2 月 21 日，我和我的前任景天魁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后，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说：“社会学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2008 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目前，在恢复和重建 30 多年后，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体系。

回顾和反思 30 多年来走过的研究历程，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问题。

一是缺乏创新意识，造成低水平重复。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有一部分“成果”，研究之前缺乏基本的理论准备，不对已有

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不找准自己在学科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必要 的问题意识，也不确定明确的研究假设，缺少必需的方法论证，自认为只要 相关的问题缺乏研究就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因此研究的成果既 没有学术积累的意义，也没有社会实践和社会政策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 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也是目前很多研究的 通病。

二是缺乏长远眼光，研究工作急功近利。由于科研资金总体上短缺， 很多人的研究被经费牵着鼻子走。为了评职称，急于求成，原来几年才能 完成的研究计划，粗制滥造几个月就可以出“成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 冲击下，有的人产生浮躁情绪，跟潮流、赶时髦，满足于个人上电视、见报 纸、打社会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顾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 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考虑 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对于课题也是以“圈”到钱为主旨，偏好于短期 的见效快的课题，缺乏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背离学术发展方向，缺乏研究的专家和大家。有些学者没有自己 的专门研究方向和专业学术领域，却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专家”意 见，“研究”跟着媒体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政策 意见，往往离现实很远，不具有操作性或参考性；而发表的学术意见，往 往连学术的边也没沾上，仅仅是用学术语言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这些都 背离了科学研究所出成果、出人才的方向，没能产生出一大批专家，更遑论 大家了。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当代中国社 会变迁研究文库”，主要是由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构成，但其主旨 是反映、揭示、解释我国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 特别是推进新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

李培林

2011年10月20日于北京

序

王晶是一个有社会关怀的青年学者，一直在关注农村贫困、医疗卫生和弱势群体救助问题。她师从经济学家魏众研究员读经济学硕士的时候就重点关注农村医疗筹资问题，博士期间转向从社会学视角进一步研究农村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找回家庭：农村代际合作与老年精神健康》这本著作，就是王晶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提炼和完善而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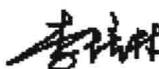
近年来，农村老年自杀问题频繁见诸报端，在统计上也呈上升态势，恐怕并非偶然。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目前正处于一个深刻的巨变之中：一是在经济方面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大量农民离开农耕转向非农产业；二是在社会方面因非农就业导致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特别是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实际远高于城镇；三是在价值规范方面受现代化、市场化的影响产生了失序，乡土社会世代延续的父慈子孝、尊卑有序规范受到消费主义、个体自由、金钱崇拜、享乐追求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巨变和冲突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慢慢累积起来，以致成为农村社会需要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家庭如何完成对老年人的关切照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学中，以往多数研究认为，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转型力量会减小家庭的规模，削弱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并由此降低子女对父母的家庭支持，家庭养老功能也会逐步被社会养老、机构养老所替代。我国在巨变中也有这种态势，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民大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恐怕家庭在养老、照料、心理关怀上始终会扮演主导角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晶的著作从家庭代际关系入手，观察和分析农村老年精神健康问题。她没有生搬硬套西方现代化理论，而是从一个变迁与延续的视角，研究中国家庭代际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比如她发现，在以“照顾孙辈为中心的代际合作”中，父子两代家庭因为隔代养育重新成为一个赡养单位；在以“照顾父辈为中心的代际合作”中，女儿的重新介入补充了儿子外出流动无法侍亲的不足。她认为，在市场化环境下，家庭功能因为重新整合而产生了有别于西方社会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是以对农村老年人生活健康（包括精神生活健康）“有利”还是“不利”作为衡量的尺子。她的结论似乎并不乐观，“老年人经济交换能力越强、隔辈照护付出劳动越多时精神健康水平就越高，换句话说，在市场化环境下，农村老年人的‘工具性价值’是决定晚年精神健康的重要变量”。这也说明，市场化条件下形成的代际合作是相当不稳定的，代际亲情在经济互助消退之后变得非常脆弱。这对我们从根源上认识和治理农村老年精神健康问题很有帮助。另外，以往研究农村代际问题以父子轴心为主要线索，王晶的著作把“女儿”角色独立出来进行讨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根据王晶的研究，在当代农村社会，女儿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娘家的经济、日常照料工作，对老年精神慰藉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对传统农村家庭功能的一个重要补充。这对我们改进和完善农村家庭老年照料政策，提高激励政策的效益很有启发意义。

总之，王晶的著作以农村老年精神健康为切入点，揭示了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巨变中需要新的社会整合的大问题。当然，这本著作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特别在理论提炼上尚有不足。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以此共勉并希望王晶能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2016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农村老年精神健康问题	1
一 研究的缘起	1
二 老年精神健康研究的理论脉络	5
三 研究框架与核心议题	10
四 研究的材料	13
第二章 代际关系变革与现代化的冲突	16
一 乡村孝道观念的嬗变	17
二 农民对老年角色的社会认同	18
三 农民不孝行为的社会制约	21
四 老年人精神期待与现代社会的断裂	23
五 小结	27
第三章 找回家庭：农村代际合作的转型与延续	29
一 从土地改革到市场化时期家庭的变动	30
二 市场化的后果：家庭权力关系的翻转	33
三 找回家庭：对抗市场化的最后壁垒	35
四 互惠与分工：父系家庭代际合作的价值基础	39
五 互惠规则之外：女儿介入父系家庭的动力	43
六 小结	45

第四章 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精神健康问题	47
一 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演进	47
二 社会资本与个体健康的关系耦合	51
三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	55
四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老年精神健康问题	57
第五章 从生命历程理解老年	62
一 生命历程理论的发展历史	63
二 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	66
三 生命历程理论下的“老年”	70
四 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研究	72
第六章 “分而不离”：居住安排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	75
一 研究数据与变量	76
二 不同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78
三 分而不离：居住安排影响老人精神健康的机制	84
四 结论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87
第七章 “照顾者”还是“被照顾者”？	
——家庭角色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	89
一 “角色”的理论基础	90
二 研究数据及变量	93
三 回归结果分析	95
四 农村老年社会角色建构的过程与意义	98
五 结论与讨论	104
第八章 从个人成就到子女成就	
——代际地位流动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	107
一 研究数据与变量	109
二 回归结果分析	112
三 结论与思考	127

第九章 儿子还是女儿？

——代际支持对老年精神健康的影响	130
一 社会支持的心理效应	132
二 研究数据、变量与方法	135
三 回归结果分析	139
四 总结与讨论	151

第十章 转型期代际关系与老年精神需求满足的社会基础 155

一 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变迁	156
二 转型社会中老年精神需求满足的社会基础	159
三 研究缺陷及不足	163
四 下一步研究的问题	164

第十一章 关于家庭、市场和政府责任的反思 168

一 引言	168
二 老年照护的社会分工	169
三 我国照护资源分配的反思	174
四 结语	176

参考文献 179

附录 调查问卷（部分） 196

后记 230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农村老年精神健康问题

一 研究的缘起

在过去 60 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型，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大饥荒，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 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到 90 年代以后快速城市化带来大规模城乡移民。2010 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 2 亿人，与之相对应，农村老龄化程度加快，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已达 13.26%^①，而由于城乡移民的因素，农村实际老龄化程度现在已经超过城市。

在过去 30 年中，农村家庭变迁主要基于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农村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化，另一个就是最近 20 年来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城乡移民。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打破了传统人们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打破了原有的基于地缘、血缘之上的家庭关系。传统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其承载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功能。变迁社会对家庭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子女流动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迁，杜鹏^②根据六普数据推算，现在农村中单身家庭户有 1824.4 万，夫妇两个老年人的户数为 2189.1 万户。按照这两个数字估算，生活在独立夫妇家庭中的老年人口总数至少有 6200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

① 数据来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公告。

② 2012 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未刊登发言稿。

传统的大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历史。

社会转型影响家庭结构更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农村家庭功能的转变，特别是赡养老人的功能上。通常认为，现代化、城市化等社会转型力量会减小家庭的规模，削弱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并由此降低子女对父母的家庭支持（刘爱玉、杨善华，2000）。家庭变迁的许多理论都涉及现代社会变迁所引致的家庭功能的萎缩。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就指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已大大更改、转变甚至完全取代了传统的社会风俗和行为模式。如在传统上照料老人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使年轻人离开了他们年老的家庭成员，破坏了住房方面的安排，学校等正式组织逐步承担了大家庭有关老年人的传统职责，这些变化拆散了大家庭，导致了老年人家庭地位的下降，所有的家庭都面临着由发展而引起的外部压力……家庭如何关心和支持对其老年人的亲切照料问题，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梅祖培，1983：69）。在传统中国农村，家庭和社区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传统农村中儿女对父母的“孝”不仅表现为要在情感上尊重父母，更要在物质上供养父母。在这样的传统文化氛围下，社区也自然而然的衍生出一套非正式的规范，比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中提到族田、团体田，即含有敬老、养老的责任（费孝通，2007；2006）。但是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子女非农就业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传统的家庭赡养制度。同时，当下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不健全，政策的不完善性更加剧了老年养老的危机。

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时期，中老年成员往往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从纵向视角看，中老年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跨越两个时期，合作化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而其主要的生命历程是在合作化时期度过。当社会转型开始之时，大部分中老年人已经不具备从事非农就业的年龄优势，特别是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有潜在的年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他们的子代无论在年龄还是在人力资本上都能适应非农就业的要求，因此家庭不同代际的成员因为适应市场化和城市化能力的差异而出现了新的调整，从事农业经营的父辈与从事非农就业的子辈之间，在劳动收入上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下，子代创造的社会财富明显高于父辈。不仅如此，子辈所继承的财产价值也在不

断贬值，目前农村中年男性主要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成年人口，他们结婚时从父母处继承的财产主要是房屋，随着子辈经济能力的增强，特别是打工收入的积累，很多子辈将原有的住房进行翻新改造，这意味着子辈从父辈继承的财产价值对其现实的意义已经大大降低了，在市场环境下，子代凭借自身能力创造的财富价值和资产价值显著地提升，与之相比，父辈在代际传承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了，随着子代后致性地位（相对先赋性地位）的提升，子代对父母的回报意识也有所降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年的赡养水平。同时，家庭关系也在发生改变，在农村合作化时代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虽然家庭结构上呈现核心化趋势，但是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社会联系并没有减弱，甚至有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亲属之间的社会纽带。在这个时期，已婚子女与父母家庭形成了一种网络式的家庭格局，他们与父母居住在较近的村庄或者乡镇范围内，日常生活上仍然保持着紧密的社会联系。但是转型社会过程中，家庭成员，特别是儿子外出可能性增大，这种网络家庭的空间分布扩展了，子女养老责任的履行也更加困难（王跃生，2009）。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表现出多方面的“不适应”和“不协调”：青壮年外出就业与老人依赖家庭养老的不适应；家庭成员地域分割与传统联系纽带削弱的不适应；代际收入水平反差造成了家庭成员地位不协调；社会保障水平低下造成了老年福利需求与供给的不协调。在这样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农村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变得相当突出。目前一些社会学家虽然没有将研究焦点放在老年精神健康问题上，但是在探讨家庭结构变迁、代际关系变动的过程中，也间接地探讨了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比如杨善华从家庭凝聚力的角度谈到，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日益深入，功利主义文化和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在拓展其影响，在这种影响下，亲子两代人之间在价值与文化方面产生代沟，导致他们对“母家庭”的疏离。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人口的流动，“事亲”变成了一项遥不可及的事情，至于“无违”，也随着父权家庭制度的瓦解被冲淡了。这种情况下，虽然父母有精神慰藉的需求，但是受时代的约束，父母通过隐忍和宽容维护了家庭的团结和亲情感的延续（杨善华，2011）。郭于华在更早时期就关注到代际关系的变化，通过对一个“将儿子告上法庭的老人的口述”，郭于华详细地描述了现代家庭交换的逻辑，传统的代际交换由情感联系和道德制约，亲子间的

互动既包含物质的、经济的有形交换，更包括情感的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代际交换关系维系的基础在于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力和权威。而现代社会，随着家庭权力下移，代际关系越来越理性化和功利化（郭于华，2001）。阎云翔以下岬村为切入点来观察农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在全书的结尾，阎云翔总结道，“家庭正在从一个上下有序的社会组织向个人情感的私人领地过渡”，在家庭私人化和个体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个人的权力、欲望、需求越来越彰显，与之相对应的，正是孝道在情感与道德两方面的没落，因此，孝道没落既是社会性也是情感性的危机（阎云翔，2006）。最近已经有些研究开始关注“老年自杀问题”，比如杨华在研究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四点老人自杀的社会基础：一是鬼神观——缺乏死后世界想象，二是生命观——个体自主处置自己的身体，三是老人观——没用了就该死，四是自杀观——老人自杀是觉悟提高的正常选择，“觉悟高”自杀是京山农村对老人自杀合法化、日常化的一套合乎当地生活逻辑的说法，这些观念形态已经构成一种既定的文化秩序（杨华，2009）。陈柏锋研究进一步剖析了“自杀秩序”的价值基础，他认为老年人的自杀“觉悟”根源还在于“祖先崇拜”，农民当代的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祖先—子孙的链条要得到完整的延续和良好的维护。如果牺牲自己能够让子孙过上良好的生活，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也是人生意义的体现（陈柏锋，2009）。这些社会学定性研究文献对我们下一步展开研究是颇有启发的，它使我们可以全景式地捕捉到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危机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中国传统社会本是一个家庭制（家族制）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地位、关系等等规范都是以家庭为原点逐步建构起来，个人的情感自然就建构在家本位的逻辑框架之下，但是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的情感危机根源可能就在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

一般来讲，研究社会变革对个体的影响有很多视角，从涂尔干研究“自杀”问题开始，到后来帕森斯研究“社会偏离”（转引自科克汉姆，2000），精神健康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范畴，个体的精神健康状态必然嵌入于一个社会形态之中，由社会形态建构而成，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等形塑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行为。也正是基于此，涂尔干发现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的自杀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由社会力量来解释的社会事实（涂尔干，2010）。对当下社会的老年人来

讲，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哪些社会力量通过哪些机制形塑了他们的精神健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二 老年精神健康研究的理论脉络

精神健康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医学、心理学、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甚至历史学。本书期望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老年精神健康问题，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就提出“家本位”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形塑老年人精神健康的核心逻辑，它决定了老年人如何认识自我存在的意义、自我的角色和地位，也会影响到老年人对子女社会支持的预期。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需要其他学科思想成果的支撑。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精神健康的学术资源做一个简要的梳理，这是我们下一步提出具体问题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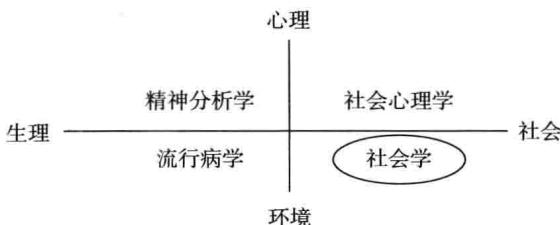


图 1-1 精神健康的学术视角

1. 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研究精神健康问题的进路

社会文化对个体的精神健康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医学人类学等都关注文化对个体精神健康的建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在于社会文化本质上形塑了个体经历和如何展现个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在社会心理学模型中，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是独立于文化背景的，而是特定时代和空间的产物，比如美国社会当下集中的社会心理疾病——抑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和人格障碍，可能不会在另外一个文化环境下集中出现。相反，在另外一个完全的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出现的精神健康问题可能在美国社会就不会出现（西方学者研究孤独症问题，而在中国背景下并不一定合适，可能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主流问题）。这个领域的核心是想展示出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如何形塑了个体的不同精神健康问题。社会心理学模型的关键在于解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衍生的不同的精神健康问